

# 中國文化研究 通讯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2020 年第 1 期

总第 13 期

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基地

主办 中国优秀文化遗产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优秀文化遗产创新智库

## 顾问

张岂之 王亚杰

郭立宏 常江

## 主编

李浩

## 执行主编

张海青 赵杭

## 责任编辑

陈战峰 任雅芳

孟飞 刘晓宇

王晨佳 王早娟

刘晓 吴红兵

## 封面题字

袁行霈

### ◆工作简讯

中心召开新见中古石刻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坊会议 / 2

中心举办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专项基金捐资  
仪式 / 3

### ◆专家观点

邱忠鸣 时尚梅花妆:中古中国女性面妆研究札记一则 / 4

尚永亮 甘晓雯 云横秦岭家何在 / 8

商伟 题写名胜:李白的黄鹤楼情结 / 11

### ◆学术平台巡礼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简介 / 14

西北大学文学院唐代文学研究情况简介 / 16

### ◆学者风采

古代文学专家——陈尚君 / 19

日本文学专家——王维坤 / 21

### ◆新书推介

《贞石论唐》 / 23

《中国石谱》 / 24

## 中心召开新见中古石刻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坊会议

2020年1月11-12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陕西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西北大学汉唐文学研究院承办的“新见中古石刻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坊会议”在西安召开。

会议由中心副主任赵杭主持,西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常江,榆林市政协副主席、榆阳区委书记苗丰和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齐志分别致辞。陈尚君、荣新江和葛承雍就墓志文献的学界热点问题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伦敦大学教授辛维廉,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查屏球,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朱玉麒,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毕波,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南开大学教授卢燕新,西南大学教授黄大宏,新疆大学教授和谈,国家图书馆编辑白云娇,中华书局编辑朱兆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胡戟、王伟,西北大学教授葛承雍、王维坤、李浩等来自海内外高校与研究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所藏碑志的释读、研究展开学术交流,探讨了新出

文献与史传文献的文史互证、中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关联性、中古时期土族家系、墓志拓本的刊刻形式等问题,开拓了碑志文献在中古史、丝绸之路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意义。

中心主任李浩教授提出,对墓志的考察整理,至少涉及到以下五个领域及其相关学科:一是生命伦理学,二是遗址景观学,三是丧葬人类学,四是图绘现象学,五是碑刻文献学。墓志碑碣的研究虽是小道,但它涉及到古人对冥界立体多元的规划和营造制作,既有观念层面的,又有技术层面和材料层面的,还有艺文美术层面的,与现代广域的宗教学、人文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材料科学息息相关,关涉“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的“大事因缘”。这对于有志于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 中心举办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学术专项基金捐资仪式

2020年1月16日,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专项基金捐资仪式在太白校区隆重举行。捐资仪式由中心副主任赵杭主持。西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常江教授代表学校发表了讲话,并为捐资者姜春园先生颁发证书。

中心主任李浩教授发表致辞,他指出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从成立之始,就积极探索、试图破解目前学术研究中的一些壁垒和难题,寻找学术研究工作体制的突破口。在学校朱雀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指导下,我们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推广部,将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普及、学术推广、学术传播、学术走出去请进来等纳入到一个崭新的机制中,以期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使中心

工作的视野更为广阔,类型更为多样,服务更为多层次。此次捐赠,是青年企业家、艺术活动家姜春园先生为支持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专题学术研究捐资的240万元。这笔专题学术项目捐助,是姜春园先生对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过往科研成果的认可,也是对今后中心学术专题研究工作的信任、期待与鼓励。

据悉,设立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专项基金旨在进行学术资源挖掘、横向科研项目资源整合,积极与地方政府及企业合作,吸引更多社会资源为中心开展高端研究。同时,也为促进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使研究中心能够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 时尚梅花妆：中古中国女性面妆研究札记一则

邱忠鸣

**摘要：**本文通过对梅花妆的个案式研究，考证文献材料，进一步厘清花钿的概念，揭示中古中国女性面妆的灿烂生动。并对围绕着美丽花钿的或美丽或诡异的传说进行文本分析，以此来管窥有唐一代女性妆容与“身体”观念的纽结、女性意识的自觉，以及男性叙事者的立场等问题。

**关键词：**梅花妆；中古中国；女性；面妆

“薄妆桃脸，满面纵横花靥！”<sup>[1]</sup>除了唐五代，还有哪个朝代的女人敢如此张扬？<sup>[2]</sup>

纵览中国古代女子形象，则有唐一代妇人至为雍容华贵，虽葳蕤绽放，却绝无失优雅典丽。从留存至今的文献，尤其是更为直观的图像材料来看，恐均如此。除了她们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信雍容之气质外，唐朝女子的这种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概由其服饰妆容来塑造，其中面妆起了极大的作用。我们熟知，当今女孩儿在面部肌肤基础护理之上，颇有再作彩妆者。不知诸君可曾注意中国历代女子化妆史上，“彩妆”之高潮当在有唐一代？正所谓“薄妆桃脸，满面纵横花靥！”唐朝女子“彩妆”之丰富浓烈，其他朝代概无出其右者。关于唐代女性化妆的研究，孙机先生《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一文，颇开筌路蓝缕之功。<sup>[3]</sup>与历代女子相比，唐代女性面妆中最具特色者，除“翠眉与晕眉”之外，孙机先生还论及了额黄、花钿、妆靥与斜红共四种。本文仅及花钿之梅花妆，拟试析之，并由此观及有唐一代女性妆容与“身体伤害”在观念上的粘连与纽结、女性意识的自觉，

以及“胡”汉关系与中西交通等问题。

### 一、何为花钿？

“西子去时遗笑靥，谢娥行处落花钿”。<sup>[4]</sup>美人已杳，笑靥尚存，颇值玩味；而美丽的花钿委落一地的情景，不知诸君作何想象？<sup>[5]</sup>

花钿，在唐人文集和诗集中，多称花子或媚子。即女性在眉心处或粘贴或描画各种图案。<sup>[6]</sup>花钿的材质有金箔、纸、鱼腮骨、鲂鳞、茶油花饼等多种，其色有红、绿、黄等。此点孙机先生已经明言。<sup>[7]</sup>从文献和视觉材料来看，花钿所贴或画的图案或为圆形等几何形，或为花、鹤、蝶、星、月等自然物形，或者在实物之上再行描绘。其中在蜻蜓翅翼上画折枝花者尤为精致鲜活。<sup>[8]</sup>

关于花钿，前贤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笔者仅补充一点。<sup>[9]</sup>即，对于唐人来说，花钿与额黄时有混用。花钿也有称作“额黄”的例子。如唐人李商隐诗中咏道：“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sup>[10]</sup>则梅花妆的始作俑者南朝宋寿阳公主初嫁之日，面部妆容最为惹人眼处便是她的八字宫眉和额黄。寿阳公主以创“梅花妆”闻名，因此梅花

妆又称寿阳妆,此处“额黄”当为“梅花妆”。那么,从李商隐的这句诗中,我们可知,公主以梅形花钿饰于眉心,且这种花钿被称为“额黄”。在这则广为流传的传说中,因冬日蜡梅落于眉心,梅痕洗濯不去而形成清丽的“梅花妆”,其形自为梅花,而色当为黄,因此被称为“额黄”亦是合情合理之事吧。只是唐时李商隐仍作此称,说明唐人对于“花子”和“额黄”,时有混称,其区别也并非泾渭分明。梁简文帝诗曰,“同安鬟里拨,异作额间黄。”<sup>[11]</sup>今之研究者多认为其是额黄,但笔者认为,此处的“额间黄”是否真是以黄粉饰额的额黄,尚待商榷。世人熟知《木兰辞》中的那位女英雄花木兰,她在代父从军,脱下戎装之后“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sup>[12]</sup>则木兰所贴之“花黄”恐亦类似“梅花妆”,与李商隐诗中所咏“额黄”当为同一物。

## 二、“梅花妆”的美丽传说,确乎?

梅花妆为花钿之一种。笔者认为其在各类花钿之中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有寿阳的传说,更因为它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窥视中古中国女性妆容与“身体”观念的纽结、女性意识的自觉,以及“胡”服饰研究汉关系等问题之一管。因此,“梅花妆”值得进一步申辨。

唐人段成式谓,“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唐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也。”<sup>[13]</sup>另,唐人宇文士及谓“今妇人面饰花子,起自唐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也。”<sup>[14]</sup>并概述其由来与流传:“隋文宫中贴五色花子,则前此已有其制矣,乃仿于宋寿阳公主梅花落面事也。宋淳化间,京师妇女竞剪黑光纸团靛,又装镂鱼腮骨,号鱼媚子,以饰面,皆花子之类耳。”<sup>[15]</sup>因此唐人已将花钿的起源归于寿阳之创梅花妆。

后世诗文中有不少关于“梅花妆”或“梅妆”的歌咏。如唐人《饰梅花妆》诗曰,“初七日又立春,梅花点额颜色新。此身若在含章殿,疑是寿阳宫里人。”五代前蜀诗人牛峤《红蔷薇》:“若缀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梅妆。”均将梅花妆的肇创者指向南朝宋时寿阳公主。

关于此事,《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杂五行书》有详尽的记述:“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梅花妆是也。”<sup>[16]</sup>

寿阳公主为南朝宋时人,而梁简文帝萧纲以及木兰与她生活的年代颇为接近。<sup>[17]</sup>寿阳创“梅花妆”一事之真伪已无可考,今日之研究者多半将其视为无稽之谈。笔者亦认为其大有作为传说的可能,但是同时也认为或者万一原为事实,只是时至今日,真的无可稽核。这或许就是史料的空白处留给后人想象的空间吧。但是,有一点我们尚可确定,南朝梁之前,在金戈铁马大背景之下的北方,亦不乏温柔的颜色,贴花钿早已是女孩们惯用的妆扮手法之一了。只是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视觉材料中,最为常见的已经是唐朝了。

## 三、围绕“花子”的诡异传说:面妆与女性身体创伤的纽结

笔者在整理唐人面妆的文献材料时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关于面妆,有着极为丰富多彩的传说。在这些传说的叙事中,花钿、晓霞妆、面靥等均与女性的身体创伤纠缠在一起。

唐人传奇《续玄怪录》卷四之“定婚店”篇记录:“杜陵韦固……元和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历奇遇,“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掌……天下之婚牍耳。”韦固于是向

“月老”询问自己婚姻之事，老人谓其妻为“此店北卖菜陈婆女耳。”次日韦固入于菜市，目睹“有眇姬，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于是心生厌恶，吩咐其奴以“一小刀子”刺杀彼女，虽未及其性命，却“才中眉间。”事过境迁，十四年后，“(韦固)以父荫参相州军。刺史王泰……因妻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之极。然其眉间，常帖一花子，虽沐浴寝处，未尝暂去。”韦固自然心中好奇，“因逼问之。妻潜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没，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sup>[18]</sup>

唐人观念中，人有宿命，不可逃脱。元和年间的韦庄以貌取人，不欲陷入命中注定的姻缘，终无法逃脱，唯有叹服命运的安排，不过最终仍是一皆大欢喜的 happy ending。“乃曰：‘奇也！命也！’因尽言之，相敬愈极。”此处，作为女人脸上美丽的风景，花钿成为男人道德甚至信仰劝谕的象征。

同为唐传奇的《酉阳杂俎》记载，“大历以前，士大夫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者，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sup>[19]</sup>唐朝多悍妇，虽是女性地位较高的一个表征，但“妒妇”们有时所用手段亦极其残忍，丈夫自是不容侵犯，于是在和其他女人的情感冲突中，将竞争者“黥面”是其常用的手段。同书另载：“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月给胭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

稍佳，崔怒曰：‘汝好妆耶？我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妆焉。”<sup>[20]</sup>在这里，花子或视如花花子或视如花子形的瘢痕则成为控诉庭院中的“妒妇”或朝堂之上的至尊的载体。<sup>[21]</sup>

另外，关于晓霞妆、丹脂面靨等妆式的传说，大多与此类同。这些围绕着“花子”等的诡异传说，充盈着血泪与曲折，述说着面妆与中古女人身体创伤的粘连与纽结。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些传说视为后人附会之作，观者或可视为无稽之谈。但是，其虽非史实，却可视为传说之类，我们是否可从中看出一部“口述史”形成的历史呢？口述史的生成，及其作为时尚养成过程中的秘器与利器，晋人王嘉已敏感地体验到此种口述历史的力量，即所谓“妖惑相动，遂成淫俗”。

今年七月以来电视上正在热播《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可谓万人空巷，是极为成功的大众传播的例子。究其原因，除了歌唱让歌声做主，让“理性”的国人重拾机会流淌感性真诚的热泪，甚至赋予信仰缺失之国民仪式感之外，节目本身策划的各个环节也极为讲究。其中，善于编织动人心弦的故事，显得极为重要，因此荧屏内外处处闪耀着动人的细节和感性真诚的泪光。这或许是节目在短期内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时尚的传播，亦无二致。唐代女子大爱的梅花妆、丹脂面靨、晓霞妆等，能成为一时之风尚，无不凭借“口述史”的力量。

#### 注释：

[1](五代)欧阳炯《女冠子》，《全唐诗》卷八九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127页。

[2]五代时女子的盛妆可视为有唐一代的流风遗韵。

[3]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文物》1984年第

4期,后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78-203页。此据《古舆服论丛》。

[4](唐)韦庄:《叹落花》,(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695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997页。

[5]读者或可纵情想象,之后或可参阅孟晖的《花落知多少·附:遗落的笑靥》,该文对此有瑰丽详尽地铺陈。详下。

[6]花钿也有簪于发髻上者。本文仅及面妆中的花钿。

[7]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中国古舆服论丛》,第190页。另,唐人诗集中也颇多称“媚子”者。

[8](宋)陶谷在《清异录》上说:“后唐宫人或网获蜻蜓,爱其翠薄,遂以描金笔涂翅,作小折枝花子。”治花鸟画史者言及绘画媒材时,是否应在绢本、纸本、墙壁之外,再加上蜻蜓翅翼呢?

[9]如前揭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另有孟晖《花落知多少·附:遗落的笑靥》《张生的礼物》可供参阅,收入氏著《潘金莲的发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36页。

[10](唐)李商隐:《无题》,引自(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787页。

[11](梁)萧纲《戏赠丽人》,收入逯钦立辑校《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39页。

[12](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4-375页。

[13](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16页。

[14](明)陶宗仪纂:《说郛》第77卷,《说郛三种》影印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刊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0页。又见(唐)宇文士及《妆台记》,辑入(明)《绿窗女史》。但笔者阅其中有关于宋淳化间女子面贴“鱼媚子”之记载,因此若《妆台记》果真为唐宇文氏所撰,那么流传至明,其间必有为后人所补者。

[15]同上注。

[16](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版,第140页。另:同书卷九七〇“果部七·梅”记载与此同,稍略:“《宋书》曰:武帝女寿阳公主入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后有梅花妆,后人多效之”。同书第4299页。

[17]《木兰辞》为北朝民歌,收入“梁鼓角横吹曲”。在音乐史上,此乐部实为十六国、北朝的地方民歌。“横吹曲”原为在马背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因其乐器有鼓与角,因此称为“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大半为北魏以降的作品,后传入南方,齐、梁以后常于宫中演绎,并由有梁一代的乐府记录存留。中华书局版有注“《诗纪》卷九六题注有‘《古文苑》作唐人《木兰诗》’句。”(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75页。明人冯惟讷将之视为唐人作品。恐误。

[18](唐)李复言《续玄怪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51-453页。

[19](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16页。“月点、钱点”,齐鲁书社版作“月黥、钱黥”,笔者倾向于齐鲁书社版的判断。参见(唐)段成式著,杜聪校点,《酉阳杂俎》,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53页。

[20](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15页。

[21]如上文所述关于武则天为惩罚上官婉儿而将之黥面的传说。

邱忠鸣,北京服装学院教授。文章原载《艺术设计研究》2012年第3期。

## 云横秦岭家何在

### ——商於之路与唐代逐臣

尚永亮 甘晓雯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个“云横秦岭”，一个“雪拥蓝关”，展示了商於之路的艰险及其与唐代逐臣的紧密关联。

秦岭，乃“天下之大阻”，“东起商洛，西尽汾陇，东西八百里”（《读史方輿纪要》卷 52），是由长安入商於路的必经之地，也是路途中最为险阻的一段。秦岭东段北麓为蓝田山，一名玉山，又名覆车山。入山往蓝田关方向，地势逐渐变高变陡，这由王维“郢路云端迥”（《游化感寺》）、白居易“路在秋云里”（《初出蓝田路作》）的诗句，即可知其山高路险之状；而据杜甫“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九日蓝田崔氏庄》），更可见其海拔落差之大，无怪乎韩愈有“云横秦岭”之叹。

商於之路自古为长安至东南的交通要道，其“扼秦楚之交，据山川之险。道南阳而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武关巨防，一举足而轻重分焉”（《读史方輿纪要》卷 54）。唐代承平二百余年，战争较少，商於道遂从军事要道转变为商旅要道，起着沟通南北的作用。唐前期此道狭小难行，张九龄谓之“小道使多，驿马先少”（《荆州谢上表》），故流量不大，现存诗文也不多。到了中唐以后，南方经济地位跃升，由此南行者日增；加之安史乱后李希烈阻兵江淮，汴路受阻，商於路遂

成为南行的主要通道。其全程一千一百多里，有驿站二十余座，经行路线大致如下：东出长安，经长乐驿、灊桥驿，东南越横岭至蓝田驿；沿途经桓公驿、蓝桥驿至蓝田关；再东南行，逾七盘岭入商州界，经四皓驿、洛源驿至商洛县，又经棣华驿、桃花驿、层峰驿达武关；出武关第一驿为青云驿，由此过阳城驿入内乡县，经商於驿折而南行，过临湍驿、冠军驿而后至邓州、襄阳（参看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秦岭仇池区》）。在这条路上，蓝田驿、蓝田关、武关最为著名，故又称“蓝武驿道”。至唐德宗贞元二年十二月，朝廷敕文明令：“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唐会要》卷 61）这条路遂升格为仅次于大路驿的“次路驿”，即全唐第二驿道。

较之长安至洛阳的两都驿道，商於之路虽艰险崎岖，却方便近捷，省日省时，故唐人奉使、贬谪、赴考、游历等多取道此途，用李涉《题武关》的话说，便是“来往悲欢万里心，多从此路计浮沉”。然而，若论及在行役中的生命磨难、人生体悟和诗作量的丰盛，则不得不首推贬谪诗人。在《全唐诗》中，现存与商於路有关的诗作近 300 首，可确定为贬谪诗者即达 98 首，占整体的三分之一；其中，白居易、元稹、韩愈、杜牧、吴融等人作品最多，他们不少人因贬迁而反复经过此路。元稹元



和五年贬江陵,白居易元和十年贬江州、长庆二年出刺杭州,均取商於一途,所谓“与君前后多迁谪,五度经过此路隅”(《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登商山最高顶》),即是明证;韩愈贞元十九年贬阳山、元和十四年贬潮州,亦皆取道此途,若将往返算在一起,已是四度经过;而柳宗元、刘禹锡于元和十年春被召还京时经由此道已无疑义,至于他们永贞元年被贬出都的详情,虽记述不多,但从残存史料推论,取道商於之路的可能性也最大(参看尚永亮《柳宗元刘禹锡两被贬迁三度经行路途考》,《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从他们的经历中,能看到贬谪文人在商於路途所遇到的重重难关,由此体味其沉重苦涩的人生况味。

作为贬谪文人所要面对的第一重“难关”,是路途险峻带给他们肉体上的折磨。此路狭窄艰险,山高水深,时有猛兽出没,充满困难和危险,所谓“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李商隐《商於新开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虽然有唐一代曾数次整修此道,但其险阻状况却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甚至所开新路“每经夏潦,摧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册府元龟》卷697)。尤其是蓝田关往武关一段,“水涉七八曲,山登千万重”(孟郊《远愁曲》)、“商岭莓苔滑,石坂上下频”(孟郊《自商行谒复州卢使君虔》),最为文人所苦。白居易《初出蓝田路作》云:“浔阳近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烦马蹄踞,劳苦已如此。”在崎岖六百里的蓝、武路段,诗人仅行“七十里”就已“人烦马蹄阻”了,可见攀登山路之艰难。如遇上恶劣天气,则更令人寸步难行。韩愈贞元十九年被贬阳山时适逢冬季,气候恶劣,“商山季冬月,冰冻绝行轡”(《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叠雪走

商岭,飞波航洞庭”(《答张彻》),即当时实况。他在《南山诗》中回忆说:“初从蓝田入,顾盼劳颈脰。时天晦大雪,泪目苦蒙瞶。峻涂拖长冰,直上若悬溜。褰衣步推马,颠蹶退且复。”本已难走的山路,因寒冬结冰,愈发地冻路滑;加上大雪纷飞,视线受阻,看不清路况,只好撩起衣服,推着马往上爬,稍不留意便会大摔一跤。如此险恶的经历,即使再次回忆也怵目惊心。

然而,苦难并未止于此。对贬谪文人来说,在漫长的驿道上,“无家”之感和遥想荒远异域所形成的恐惧、惶惑时时侵蚀着他们的心灵,这是更甚于高山险路的精神折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未知世界,生命宛如一片随处飘荡的浮萍,不知何以为家,何处是家,此行何时生还,能否生还。诸如“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白居易《初贬官过望秦岭》)、“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韩愈《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表现的都是这样一种饱含“分离焦虑”的心态。韩愈有诗云:“群鸟巢庭树,乳燕飞檐楹。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食曲河驿》)飞鸟尚能归巢,自己却负罪远行,两相比照,不胜悲哀!除了文人自己要星夜兼程外,他们的家属也常常需要随行。如白居易贬江州,其妻儿即相继踏上征途:“商州馆里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发商州》)、“亲故寻回驾,妻孥未出关”(《宿阳城驿对月》)。韩愈贬潮州,同样携家眷上路。据事后回忆,他被贬时正逢第四女病重在床,但迫于严诏,仍不得稍事逗留,以尽为父之责,在无比悲凉中与家人“苍黄分散”。而韩愈刚走,其家人即被有司迫遣,逐出京师,踏上冰天雪路。这时,在旧家的不存在,眼下家人又处于颠沛流离的旅途上,这对负有全家重责的韩愈来说,怎能不五内俱伤?眼望

秦岭云横,回首京都渺渺,他又怎能不发出“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泣血之问?但痛苦还未结束,由于“我既南行,家亦随遣”,其十二岁的爱女不得不带病就道,“走朝至暮”,“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饮,又使渴饥”(《祭女孥女文》),终于在距离长安约450里的层峰驿死去。“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过其墓留题驿梁》),种种变故给这位年逾半百的诗人带来了锥心刺骨的痛楚,其所遭受的精神摧残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

在这条艰险的驿道上,不仅埋葬着韩愈的爱女,还铺满了贬谪文人的累累白骨。唐代文人在贬途中被赐死的事件时有发生,性命朝不保夕。据史书记载,商於道上死亡的“高发地段”集中在蓝田驿:开元十二年(724),太子少保、驸马都尉王守一“贬为泽州别驾,至蓝田,赐死”;二十四年(736),周子谅“于朝堂决配流灊州,行至蓝田而死”;二十五年(737),“太子妃兄驸马都尉薛锈长流灊州,至蓝田驿赐死”;宝应元年(762),“襄州刺史裴茂长流费州,赐死于蓝田驿”;大和九年(835),翰林学士顾师邕“流崖州,至蓝田赐死”;光化三年(900),“平章事、监修国史王抄贬崖州司户,寻赐死于蓝田驿”(《旧唐书》卷8、卷103、卷9、卷11,《新唐书》卷179,《旧唐书》卷20)。蓝田驿外,还有些人被赐死于商州以及商於之路的

延长线如公安、武昌等地。可以说,在整个贬途,死亡都如影随形,与逐臣相伴。“苍黄负谴走商颜,保得微躬出武关”(吴融《宿青云驿》)、“山下驿尘南窜路,不知冠盖几人回”(许浑《题四皓庙》)。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不能不让人如履薄冰,心生极大的恐惧。可以说,在这条路上,书写着贬谪文人的生命沉沦,见证着政治高压的无比严酷,更凝聚着一种悲凄惨烈的文化内涵。白居易诗说得深刻:“皆疑此山路,迁客多南征。忧愤气不散,化结为精灵!”(《和〈思归乐〉》)无数南行逐臣的贬迁路途由此开始,其人生悲剧也由此拉开帷幕,为无家而悲痛,为前途而担忧,为生死而恐惧,种种忧愤郁结于心,日积月累竟化结成令人恐惧的“精灵”!而这种积聚着无数“迁客”生命沉沦史的文化气氛,使得每一位后来者一踏上此途,便不能不产生一种深深的惶恐和刻骨的凄怆。就此而言,这条唐人被贬东南地域所经行的第一通道,乃是一条“充满迁客血泪的贬谪之道”(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天津出版社1993年版),它为唐诗之路染上了一抹沉重的底色。

尚永亮,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甘晓雯,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文章原载《光明日报·光明文学遗产版》2019年3月2日。

## 题写名胜:李白的黄鹤楼情结

商 伟

坐落在武昌长江岸边的黄鹤楼因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诗而家喻户晓。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传言李白“欲拟之较胜负,乃作《金陵登凤凰台》诗”。这场以诗角逐的竞赛,围绕名胜书写而展开。李白明知黄鹤楼上已经署上了崔颢的大名,在此攻城拔寨,已近于徒劳,于是换了一处战场,到金陵凤凰台上接着上演这场竞争的游戏。在《登金陵凤凰台》中,李白用凤凰替换了黄鹤,却搬用了《黄鹤楼》的韵脚和句式结构。在其他的创作中,李白仍不断回到黄鹤楼一带,继续向崔颢挑战。

李白从黄鹤楼上下来,又到凤凰台上去与崔颢较量。但他仍不断回到黄鹤楼一带,改换一个角度,继续向崔颢挑战。这一次他并没有以黄鹤楼为题,而是把视线投在了鹦鹉洲上,诗题就叫作《鹦鹉洲》。而这正是崔颢《黄鹤楼》诗中写到的“芳草萋萋鹦鹉洲”。

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唐代的鹦鹉洲今已淹没,原为武昌城外长江中的陆洲,上起鲇鱼口,下至黄鹤矶,大致坐落在今武

汉市西南一带的长江中。由崔颢的诗中可知,从黄鹤楼上一眼望去,鹦鹉洲和长江北岸的汉阳树一样,都清晰可辨,如在目前。然而有意思的是,李白在鹦鹉洲上“极目”四望,却全然不见黄鹤楼的影子。黄鹤楼与鹦鹉洲之间的空间关系,本来蕴含了通过目光往还而形成应答对话的可能性。崔颢从黄鹤楼上把目光投向了鹦鹉洲,但李白却没有从鹦鹉洲上报之以回望。他对来自黄鹤楼的凝望视而不见。这是有意为之的不见,不是真的没看见或看不见。

唐代写鹦鹉洲的诗篇远不及写黄鹤楼的多,在李白的时代,还有孟浩然的一篇《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首联开门见山: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黄鹤楼与鹦鹉洲,就像一副对联的两个对句,彼此难分难解,尽管也不是没有例外。这是来自黄鹤楼的眺望,正像崔颢笔下的鹦鹉洲,完全笼罩在了他的目光之中。而这样一个鹦鹉洲的形象,因此就被纳入了以黄鹤楼为中心的视域中去了。但李白的这首诗《鹦鹉洲》,却把鹦鹉洲从黄鹤楼的视域中抽离出来了。他创造了一个以鹦鹉洲为核心的世界,与黄鹤楼没有目光的交会与往还,与崔颢《黄鹤楼》诗所写的空间也避免发生任何交叉或重合。最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将黄鹤楼从视野中一笔抹去,没留下一点痕迹。这是一次出色的心理防卫:他成功地避开了赫然在目的黄鹤楼,至少从视觉上看是这样。

但反讽的是,尽管黄鹤楼渺无踪影,《黄鹤楼》诗的句式与意象组合的方式却没有随之消失,反而在

李白的《鹦鹉洲》里大张旗鼓地重现了。同他的《登金陵凤凰台》相比,这首诗更接近崔颢的《黄鹤楼》诗,几乎亦步亦趋地照搬了后者的诗行结构。于是,《鹦鹉洲》一诗在“黄鹤楼的缺席”与“《黄鹤楼》诗的重现复制”之间,就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与互补关系:一方面是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却又纠缠不休。除了首句之外,取代黄鹤而来的鹦鹉,也在原诗黄鹤一词的位置上,毫无悬念地出现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内心的黄鹤楼“情结”,如何在视觉呈现和文字修辞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分别折射出来。

我不想在心理分析的路上走得太远,因为难免有猜想和揣度的成分。但《鹦鹉洲》在见与不见、变与不变之间,还是留下了许多解释的空间。它的头两联出自《黄鹤楼》,但把“鹦鹉”变成了首句的主语,置换了崔颢诗中的“昔人”。“昔人已乘白云去”变成了“鹦鹉来过吴江水”,鹦鹉因此扮演了更主动、更重要的角色,但《黄鹤楼》诗的句式和词法基本保持不变。可以想见,李白花了一番功夫揣摩原诗,就像是在做句式练习。唐段成式(约803—863)《酉阳杂俎·语资》云:

[按:李]白前后三拟《词选》[按:《李太白集》王琦注引作《文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

模拟《文选》正是当时的一种写作练习,连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李白也是这么练出来的。从《鹦鹉洲》可以看到,李白似乎还拿不准怎样才能超越崔颢,有一点儿缩手缩脚,按部就班,读起来就像是一篇不成熟的句法习作。但李白拆解《黄鹤楼》诗又重新加以组装的技巧,仍不免令人赞叹。

比如说,《黄鹤楼》的颈联是“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到了李白的《鹦鹉洲》,就变成了颌联的第二句“芳洲之树何青青”,也就是将原诗中的两句合并成了一句来写。此外不要忘了,在

唐诗的敦煌抄本中,崔颢诗中的“春草萋萋”就写成了“春草青青”。而所谓“芳洲之树”的“树”,显然出自“汉阳树”,“芳洲”反身自指“鹦鹉洲”。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中也是用“芳洲”来写鹦鹉洲的:“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芳洲”最早的出处自然是《楚辞》,但在这个特定的题目上,很难说与崔颢的《黄鹤楼》无关。如前所述,在《黄鹤楼》的后世流传本中,“春草萋萋鹦鹉洲”作“芳草萋萋鹦鹉洲”。正因为如此,我不想轻易否定这个后世广为传播的《黄鹤楼》版本,其中的“芳草”尽管不见于现存的唐人唐诗选集,但也可能来历久远,故未可遽下断言。当然,我们最终也不能排除李白创造性地“误读”原作,用“芳草”替代了崔颢诗中的“春草”。

《鹦鹉洲》的尾联是“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它向我们展示,李白的模拟练习,不仅体现为在原诗的空间架构内部进行意象和词汇的替换,还体现为诗歌时间的顺延:他用“孤月”替代了崔颢诗中的“日暮”,而从“日暮”黄昏到“孤月”高悬,在时间上是一个延伸的关系,也就是接着《黄鹤楼》一路写了下来。而那个极目远眺的望乡人,也仿佛穿越了《黄鹤楼》篇末的那个凝固的瞬间,从日暮一直伫立到月夜,进入了《鹦鹉洲》的时间范围。

回头来读李白《鹦鹉洲》的首联和颌联,我们不难看到,诗歌文本的互文关系何等强大,足以抹杀或掩盖掉题写胜地自身的特殊性。李白以鹦鹉取代黄鹤,但它们背后的典故却各不相同,无法相互替换。黄鹤楼固然是因为黄鹤而得名,但鹦鹉洲之所以得名,却与鹦鹉无关,而是因为东汉晚期的祢衡(173—198)曾经作过一篇《鹦鹉赋》。

据传,江夏太守黄祖的长子黄射曾在此设宴,有客献鹦鹉,黄射便请祢衡为之作赋。祢衡的《鹦鹉赋》借鹦鹉以自寓,写自己寄人篱下、怀才不

遇的命运。他如同鸚鵡那样,或流飘万里,远播陇山,或身陷雕笼,心力交瘁。可那毕竟是寓言文字中的鸚鵡,未可坐实来看。而客人献上的那只鸚鵡,本为笼中之物,又哪里谈得上自来自去呢?

所以,《鸚鵡洲》的头一句“鸚鵡来过吴江水”,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可没有根据不等于没有出处,它的出处就正是崔颢《黄鹤楼》中的“黄鹤一去不复返”!黄鹤的掌故与鸚鵡毫不相干,用到《鸚鵡洲》中,自然造成了名实之间不相吻合。“江上洲传鸚鵡名”,已经是空有其名了,正如“此地空余黄鹤楼”。而“鸚鵡来过吴江水”从一开始就子虚乌有,有名无实。它唯一的凭借正是它与《黄鹤楼》之间的互文关系:这是一个文本上的联系,因文生事,因事见情,只不过用“鸚鵡”偷换了《黄鹤楼》里的“黄鹤”罢了。

这无疑是一只寓言中的鸚鵡,但在李白的《鸚鵡洲》中似乎失去了《鸚鵡赋》中的象征寓意,而变成了描写的对象。不过,这一转变并没有真正完成,毕竟“鸚鵡”是从《鸚鵡赋》中引申或借用而来的,因此也只能通过这一互文关系来理解。此外,在《鸚鵡洲》的尾联中,李白将言说者的身份确定为“迁客”,可见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祢衡《鸚鵡赋》中鸚鵡流飘万里、远播陇山的颠沛流离的象征性。然而,李白的《鸚鵡洲》不仅复制了《黄鹤楼》的篇章和句法,而且在尾联中从意义和结构的层面上同时呼应并延续了崔颢《黄鹤楼》的尾联。这再次提醒我们,它的母本是《黄鹤楼》,而不是《鸚鵡赋》。而在《黄鹤楼》所设置的框架中,《鸚鵡赋》中的那只鸚鵡终不免徘徊于写实与寓言之间,显得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由上可见,李白虽然题写鸚鵡洲,但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崔颢的《黄鹤楼》。在李白这里,题写的具体对象绝非关注的所在,甚至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让他去复制《黄鹤楼》的诗行句式

与通篇结构,并对其实施改造。

关于《鸚鵡洲》,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怀疑它是崔颢的作品,对此我们需要做一点说明。实际上,李白与崔颢的诗作发生混淆,并不限于这一首。傅璇琮在《唐才子传校笺》中,参照清人王琦的注本《李太白全集》,对《入清溪行山中》二首,略作考辨。正如王琦指出的那样,《文苑英华》把这两首诗都列在了李白的名下,但其中一首又见崔颢集。可知在宋初就已经出现了李、崔二人诗作相混的情况。前面说过,他们两人的诗风颇有相近之处,发生混淆也不令人惊讶。但《鸚鵡洲》一诗的情况还略有不同。崔颢模仿自己的《黄鹤楼》重写一篇的可能性不高,除非是拿它来试笔,也就是先有《鸚鵡洲》,而后有《黄鹤楼》。但无论何种情况,都缺乏证据的支持。从艺术成就来看,同样是出自《黄鹤楼》,《鸚鵡洲》跟《登金陵凤凰台》固然无法同日而语,与《黄鹤楼》相比,也只能算是一篇模拟的习作。有人猜想,李白先依照《黄鹤楼》写了《鸚鵡洲》,自知不如,却又“于心终不降”,直到写出了《登金陵凤凰台》,“然后可以雁行无愧矣”。虽无证据,可备一说。不论如何,崔颢都没有必要在《鸚鵡洲》的题目下重写一遍《黄鹤楼》,但李白这样做的可信度就要高得多——关于他与《黄鹤楼》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呢。

重温崔颢《黄鹤楼》首句的“白云”“黄鹤”之辨,我们既已读过了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头一句“凤凰台上凤凰游”,又有李白《鸚鵡洲》开篇的“鸚鵡来过吴江水”为证,《黄鹤楼》以“昔人已乘黄鹤去”起首,看起来也并非没有可能了,至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在李白的心目中是如此。这正是李白的《鸚鵡洲》带给我们的一个意外收获。

商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内容节选自《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第三章,商伟著,三联书店,2020年1月出版。

##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简介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是全国成立较早并经民政部正式注册的中国古代断代文学研究之学术团体。1982年5月4日至11日，全国24所高校、科研和出版单位联名发起，在西北大学举行了“全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经参加会议的近百家单位的180余名代表讨论通过，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正式成立。在此次大会上，制定了学会章程，确立了学会的宗旨、任务、会员权利与义务以及学会组织机构，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并推选了学会正副会长及正副秘书长等，确定学会秘书处设于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以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主编的《唐代文学》作为学会会刊，编辑出版《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会员通讯》等刊物。根据学会章程，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及理事会，以组织开展唐代文学的研究，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提高唐代文学的教学、研究水平，普及唐代文

学知识，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成立，促进了国内外唐代文学研究交流活动的有序展开与研究的不断深化。自兹以降，学会在组织全国唐代文学的学术活动、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提高唐代文学研究水平以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学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国内唐代文学研究界为主的定期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学会会刊《唐代文学研究》（《唐代文学》改名）与《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编辑出版，一直赓续不断。截止2019年底，学会已先后组织举办了十九次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刊《唐代文学研究》（包括其前身《唐代文学》）已出刊29辑，《唐代文学年鉴》逐年出版，自1983年至今也已连续出版35集。近二十多年来，学会的学术交流，不仅人数规模渐次壮大，而且范围也越来越广，除国内的同行学者外，日本、韩国、美国、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学者，也都积极参与学会的学术交流活动，从而提高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扩大了唐代文学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影响，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繁荣中国当代学术，提高我国的文化影响力，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也以组织最严谨、活动最规范、成果最突出而备受学界称道。

目前，学会仍然依据学会章程，坚持两年一

届的年会与学术讨论会,并通过学术活动,广泛团结海内外研究同道,引领学术风气,传播学术信息,培植学界新秀,推动学术进步。同时,还坚持通过学会会刊《唐代文学研究》与《唐代文学研

究年鉴》的编辑出版,及时刊布唐代文学研究最新成果,交流学术研究前沿信息,为海内外学人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学术资讯与刊布成果的平台。



## 西北大学文学院唐代文学研究情况简介

唐代文学研究是西北大学文学院历史悠久、实力较强、成果也很突出的研究方向之一。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傅庚生先生即以杜甫研究而在海内外学界广有影响,八十年代初期,安旗先生则以李白研究而深受海内外学人关注。由于良好的学科发展传统与深厚的学术积淀,1980年代初,西北大学中文系遂整合研究力量,组织研究队伍,成立了以研究唐代文学方向为中心的唐代文学研究室。在当时国内中文学科中,这是较早由院系创办的中国古代文学断代文学研究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后来唐代文学研究学科方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算起,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唐代文学研究,至今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七十年来,文学院的唐代文学研究学人,勤奋耕耘,成果迭出,薪火相继,承传有序,且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壮大,使本方向不仅在本院中文学科中形成优势与特色,而且在全国同类学科中也获得

了良好的声誉,有“唐代文学研究重镇”之称。

傅庚生先生早年即以《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等著著作称于世。二十世纪四十年后,他则致力于杜甫研究。五十年代初,其研究杜诗的专著《杜甫诗论》正式出版,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杜甫诗歌的著作。无论是论述之角度还是全书之框架体系,该著都体现了杜甫研究的新面貌,为后来的杜甫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六十年代以后,他又先后出版有《文学鉴赏论丛》、《杜诗析疑》、《杜诗散绎》、《百家唐宋诗新话》、《百家唐宋词新话》等著作,在古典文学的欣赏与杜甫诗歌的深度解析与阐释上,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安旗先生早期以新诗批评著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则致力于李白研究,以其卓越建树,遂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李白研究专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她先后出版有《李白传》《李白纵横探》《李白年谱》《李白诗新笺》《李诗咀华》(合著)、《李白研究》《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合著)、《我读李白》《李白诗秘要》《李太白别传》等著作





多种。其中《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为国内第一部李白诗文集的编年注释本,在李白作品编年方面多有创获,出版后深得学界好评。2015年该著以《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之名收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系列再版,是新中国成立后李白诗文集注本中最有影响的注本之一。

1980年代初,由于唐代文学研究室的成立,再加上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唐代文学教学研究的力量,使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唐代文学研究队伍壮盛一时。其中除了傅庚生、安旗、景生泽等前辈外,相较年轻一辈的则有梁超然、武复兴、韩小默、房日晰、韩理洲、阎琦、李云逸、雷树田等先生。

梁超然先生是国内有影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治学范围较广,而在唐代文学特别是中晚唐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尤为显著。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先后发表了不少相关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颇受学界的关注。八十年代后,他先后有晚唐诗人小集的笺注与论著出版。后来又参与了由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的撰写,承担了众多中晚唐多位诗人传记的笺证工作。其相关著述,先后结集为《八桂诗人论及其他》及《三书斋文存》(四卷)等。

韩理洲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与文献整理方面成绩突出,其中陈子昂、王绩研究以及唐文、魏晋六朝文的考辨整理,尤多创获。先后出版有《陈子昂研究》《陈子昂评传》《王无功集五卷本会校》《唐文考辨初编》《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唐高祖文集辑校编年》《全隋文补遗》等著作。

阎琦先生也以唐代文学研究著称,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在韩愈研究与李白研究上用功尤多,深得学界好评。先后出版有《韩诗论稿》、《韩愈评传》(合著)、《韩昌黎文学传论》《韩昌黎文集

注释》《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合著)、《李诗咀华》(合著)、《唐诗三百首续选》《李白集导读》、《唐诗精华二百首》《唐诗与长安》《李白诗选评》《刘禹锡诗文集》《〈长安志〉〈长安志图〉校点》等著作。

房日晰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而以唐代文学研究见长,兼及宋词与明清小说。其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长期致力于唐诗的比较研究,独树一帜,先后有《唐诗比较论》、《唐诗比较研究》等论著。后来又有《宋词比较研究》及《论诗说稗》等著作出版。

李云逸先生功底扎实,于唐代作家别集整理用功尤勤。其《王昌龄诗注》颇见功力,是深受学界的好评的王诗注本。遗著《卢照邻集校注》则被列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成为卢照邻别集整理中最为重要者之一。

雷树田先生长于诗词曲创作及其格律研究,于诗词创作用力甚勤,数量颇丰,并出版有《诗词曲赋联语格律问答》等著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唐代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崭露头角,其中李浩教授尤为突出,是新一代学人的代表。八十年代后期,他在唐诗美学研究、唐代园林别业与文学关系研究方面,已有骄人的成绩。此后,其在唐代园林文化研究、唐代家族地域与文学研究方面继续开掘深化,均有出色的成果问世,先后出版有《唐诗美学》《唐诗的美学阐释》《唐代园林别业与文学考论》《唐代关中土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土族研究》《唐代园林别业考录》等著作多种。目前,他正在承担着中国古代园林文献整理与研究以及唐代新出土碑志文献研究、清编《全唐文》的整理等众多研究项目。

李芳民教授主要致力于唐代作家作品研究及唐代佛教文化与文学的相关性研究,其中在唐

代寺院及其与文学的相关性研究方面多所用力,有著作《唐五代佛寺辑考》出版,参与撰写的著作则有《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中外文学名著导读》《中国文学作品选注》《唐文选》等。

郝润华教授以文献学研究见长,在唐代文学与文献研究方面也成果斐然,其中在杜甫研究、韩愈诗文集整理等方面尤为突出,有《〈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整理)等著作出版。

傅光先生为傅庚生先生哲嗣,其承继家学,于杜甫研究用力最多,先后发表有关杜甫研究的论文多篇,并出版有《杜甫论集》(合著)、《杜甫研究(卒葬卷)》等著作。

进入二十一世纪,西北大学的新生力量不断加强,年轻一辈思维敏锐,勇于创新,是本学科发展的未来希望。这一辈人数不少,如田苗、邵颖涛、王松涛、陶成涛、任雅芳、孟飞博士等。其中田苗博士曾发表论文多篇,并出版有《女性物事与宋词研究》一书。邵颖涛副教授致力于唐代小说研究,著有《唐代叙事文学与冥界书写研究》等著

作。王松涛博士曾发表论文多篇,并参与点校整理《圣因接待寺志》《玉岑山慧因高丽华严教寺志》《孝慈庵集》等多项科研项目等等。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视以及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学术研究的环境、学术著作的出版等情况都有了极大的改观。西北大学文学院的老一辈学人则多老当益壮,笔耕不辍,不断有新成果推出;而新一辈学人则在积聚学养的同时,锐意进取,头角峥嵘,显示出勃勃英气与强劲的发展潜力。目前文学院的唐代文学研究,积极整合研究队伍,多方集聚人才,积极推动学科发展,显示出强大的学术后劲。目前的学科成员,大都承担了多方面的研究课题,在不断吸收新的学术思想与理念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也时时关注学界动态,保持自己研究与学界前沿的同步共进。因此,展望未来,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唐代文学研究,一定能承继前辈荣光,不断开拓进取,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的辉煌。



## 唐代文学名家——陈尚君



陈尚君，浙江慈溪人，1952年6月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任重书院院长，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古籍规划小组成员等。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交换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学者和台湾逢甲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客座教授。

陈尚君教授治学遵循传统，长于文献考据，对中国中古文献有较全面的把握，对唐五代基本文献建设用力甚勤。其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既得益于导师朱东润先生和复旦大学中文系王运熙先生、陈允吉先生、王水照先生等，同时又深受钱大昕、劳格、王国维、陈垣、余嘉锡、陈寅恪、岑

仲勉等古今学术大师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熟练掌握目录学，对唐宋典籍的存佚状况烂熟于心，故能够对所涉课题作竭泽而渔式的网罗，力争全面掌握史料；二、讲求“史源学”，在研究中强调溯本寻源，有理有据，力求提出新见而又“实事求是，多闻阙疑”；三、治学兴趣广泛，于辑佚考辨之外，对唐代的各种人事典籍，对唐前和宋代的典籍，都有所关注，且不仅局限于文学方面。

陈尚君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文献资料的辑佚、考证工作，学术成果颇丰。以对唐代诗文的网罗、校订和辨析与唐宋作家生平研究论：第一，《全唐诗补编》在广泛检书 5000 余种（含总集、方志、谱牒、说部、敦煌文献、佛道二藏、域外文献等）的基础上，共辑得逸诗 4600 多首（其中新见作者 800 多人），超过前人辑佚总合。此外又对《全唐诗外编》一书作了大量考订工作，包括覆校原书、补引书证、考订作者事迹以及删芟误收唐前后人诗以及与《全唐诗》重出之诗等。该书一经出版，即受到海内外学界极高的评价，被认为是“清代中期以后唐诗辑佚的最大成果”。第二，《全唐文补编》从相关正史、政书、类书、地志、石刻以及出土文献中，录得清编《全唐文》失收的唐人遗文 6200 多篇，编为 160 卷，相当于前人所得唐文四分之一强。文章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且其中有不少是极珍稀的文献，对唐代各方面的研究均有很大参考价值。第三，曾先后参与《百科知识辞典》《辞海》文学分册

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唐诗大辞典》、中华书局《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的撰写与修订。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为例,为唐五代中小作家作传总计 2000 多条,共 30 万字,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其中至少千余名作者为首次被揭出研究。第四,与陶敏先生合作《唐才子传校笺》补正(《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所补涉及 280 余人,而且多为重要作家,部分研究更是发前人所未发,唐代作家研究由此取得重大进展。第五,近作《唐女诗人甄辨》就今知有名录记载的近 150 位唐女诗人及其诗作进行了考辨,可以确认唐代实有其人的女性作者有 84 人,在传闻疑似之间者凡 18 人,可以确认虚构、误认或者后出者为 42 人,真正还原了“不平凡时代各种具有独特个性的才女奇媛的人生与文学”。第六,近十余年全力以赴编纂《唐五代诗全编》,重新会校写定全部存世唐诗,总 1000 多万字,即将定稿。第七,著有论文集《唐代文学丛考》、《唐诗求是》等,发表各类论文及各类文章逾 500 篇,其内容多关乎唐宋文人生命轨迹之考察、诗文可靠文本与文献的重建,如《杜甫为郎离蜀考》《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花间”词人事辑》《欧阳修著作考》《晏几道生平零考》《姜夔卒年考》《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诗文拾遗》等。而与汪涌豪合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在海内外反响尤为强烈,该文分别从唐宋元明长时期内对《二十四诗品》记载之有无和确证苏轼之语(“自列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所指并非《诗品》两个方面入手,对历来持为定论的《诗品》作者提出异问,给唐诗学界和文论学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陈尚君教授在文献考订上不限于文学,还做史学方面的工作。

如《〈登科记考〉正补》为清人徐松《登科记考》补录了唐代科举人事 700 多则,相当于原书的五分之一。又如《〈新唐书·艺文志〉补——集部别集类》根据史书、方志、笔记、唐宋人文集等记载,新补 406 家,446 部,所补约为原来的六分之五。代表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则对清辑本作全面的剖析,同时采用新的体例,在穷尽五代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将《旧五代史》恢复到《五代实录》的面貌。陈尚君教授治唐代文史,素来重视对石刻文献的利用。《贞石诠唐》即为其研究唐代石刻的论文汇集。该书一方面系统把握当代辑成的新出唐代石刻,对这些新编文献增补存世材料的成绩、整理文字的优劣都给予了文献学视角的批评;一方面利用石刻文献开拓文史研究的新问题,如《石刻所见玄宗朝的政治与文学》就是以开元天宝时期作出的具体示范。《宋元笔记述要》为陈尚君教授新著,举凡五代至元 156 种,宋元笔记之要者基本都被囊括在内。其对笔记成书过程和文献价值的挖掘与考证,对其完残真伪的判读,每每能抉隐发微,提出新见。

陈尚君教授亦多次参与古籍整理,曾承担《唐人选唐诗新编》(含增订本)、《中华野史》《五代史料汇编》等项目的部分辑校工作。后于 2006 年至 2015 年主持《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修订,新修订本获 2016 年年度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至 2019 年 11 月 8 日,由其率领的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已正式启动。

诚如葛晓音先生所言,凡是治唐代文学者,陈尚君教授的著作都应必备。此外,其转益多师,不依袭旧说、力争创新,而又重实证、重传统,严格遵守学术规则,追求勤而博、细而精的治学路数与研究风格,同样可以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 考古学、日本文学专家——王维坤



王维坤,日本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以及《丝绸之路考古》的教学、考古发掘与综合研究。自1986年至今,先后在日本同志社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两年)、做客座研究员(一年)和客座教授(两年);在富山大学做外国人研究者(一年多),并承担教学任务;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客座教授(半年),从事竹筒学考证研究;被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为首席专家和客座研究员(一年),主持共同研究课题《古代东亚交流的综合性研究》,在此期间,出版了共同研究报告;在东京专修大学做客座教授(半年),承担四门课程。此外,还与日本奈良教育大学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工

作;作为客座教授访问日本山口大学人文学部,并参加《第二届日中古代都城研讨会》和在广岛大学给研究生和博士生搞集中讲义。迄今为止,出版中日文专著、译著十多部,发表中日文论文一百三十篇,并在国内外举行了一百多场不同类型的讲演会。

王维坤教授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主要涉及中日古代都城的比较研究、文物制度交流研究以及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的综合研究等领域。

### 一、中日古代都城的比较研究

早在1986年4月1日,在日本同志社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以《关于古代中日都城的研究——以长安城与平城京为中心》(日文版,同志社大学大学院修士论文,1988年)为突破口,展开了全面系统的中日古代都城的比较研究。1988年3月获得硕士学位后,其指导教师森浩一先生希望他能够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由于母校西北大学师资力量匮乏,亟待需要他回国为同学们上课。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安排。后来两校最终达成商议,一边上课,一边在森先生的指导下搜集考古新资料,条件成熟后,重返同志社大学继续深造。他将同志社大学大学院修士论文翻译成三篇系列中文论文予以发表,即《隋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的比较研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和《日本平城京模仿中国都城原型探究——中日古代都

城研究之二》(《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以及《日本平城京模仿隋唐长安城原型初探》(《文博》1992年第3期)。一言以蔽之,久负盛名的日本平城京完全是模仿隋唐长安城的建制而建造的一座历史古城。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优秀的都城传统文化被破坏的千疮百孔,而在现在的日本奈良平城京却依然能够看出我国隋唐长安城里坊建制的孑遗形态。

1992年9月,森浩一先生原想以月薪60万日元的高薪待遇聘他直做客座教授,结果还是被他婉言谢绝了。他特意向森先生作了如下回复:“我是您的学生,与其说这次让我去做客座教授倒不如让我先做月薪30万日元的客座研究员,我想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做您的博士生无尚光荣。”森先生便欣然应允了。期间,他用了一年的功夫,直接用日文撰写了3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的研究》(上、中、下三册)。顺利地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取得了日本同志社大学文学(文化史学)博士学位。在日本同志社大学100多年的历史中,他不仅是第一位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外国人,而且也是该校当年最年轻的、用时最短的文学博士。为此,《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月25日第3版,以《从生产队长到文学博士——记西北大学留日归国博士王维坤》为题进行了跟踪报道。在拿到学位的第三天,他谢绝了数所日本大学的聘请,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到了母校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1997年11月,日本朋友书店正式出版了他的日文博士论文《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的研究》一书,立即在中日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此书一上市,很快就销售一空。京都大学名誉教

授上田正昭先生高度赞扬说:“王维坤教授是中日古代都城比较研究第一人!”

## 二、文物制度交流研究

在他的130多篇论文中,有关论述中日文物交流的论文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例如,1. 王维坤:《平城京的模仿原型》(日文版),上田正昭编:《古代的日本与东亚》,小学馆,1991年;2. 王维坤:《中国唐三彩与日本出土的唐三彩研究综述》,《考古》1992年第12期;3. 王维坤:《丝绸之路与死者口中含币的习俗》(日文版),森浩一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系列丛书6 考古学与信仰》,1994年;4. 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年第1期;5. 王维坤:《试论日本正仓院珍藏的镀金鹿纹三足银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6. 王维坤:《则天造字和日本国内“则天文字”的受容》(日文版),上田正昭编:《古代日本与渡来文化》,小学馆,1997年等。

## 三、古代东亚交流的综合研究

2007年4月,他应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之邀,以首席专家和客座研究员的双重身份,组建了一个由日本国内30位教授组成的共同研究会,从事《古代东亚交流的综合研究》。通过大家一年的努力,其《共同研究报告书》于2008年12月按时出版发行,取得了预期的圆满成果,受到中心一致好评。

今后,随着中日两国考古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不断出土的考古新资料必将为我们利用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成为可能,我们期待着中日合作研究的春天如期而至,期待王维坤教授更多新的研究成果。

## 新书推介

### ◆《贞石诠唐》

陈尚君,浙江慈溪人,现为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他的著作《贞石诠唐》于201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是陈尚君教授研治唐代石刻的论文汇集,凡31篇。据其自序,论次为五列:其一通述石刻文献之研究意义者2篇,其二据石刻考订文史而能淹贯一代者7篇,其三以个案研究为主者9篇(第9篇《贞石偶得》哀辑不同时期短札11则),其四为书序书评及综述者11篇,其五则以长沙窑瓷器题诗为附录者2篇。

论集的重要特点,是在已知唐代文献通盘把握的基础上,对新出石刻文献做竭泽而渔的追踪研究。本论集中以《石刻文献述要》为首的书评与综述性论文,构成了一个从古到今石刻文献比较完整的信息渠道。它不仅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以往石刻文献的大宗,而对当代辑成的新出唐代石刻也有系统的把握,特别是对这些新编文献增补存世材料的成绩、整理文字的优劣,都做出中肯的评述,给予这些文献整理以文献学的批评,便于读者具有针对性地使用新史料。正因为作者研究石刻文献的目的在于与存世文献之间实现全面融通的史料互补,从而由唐代人事的新材

料带动研究的新天地,因此其研究具有了突破学科的分类而镕铸为文史兼容的新格局。论集中更多的文章,是利用石刻文献研治文史的重要贡献,也是作者利用石刻文献开拓文史研究新问题而就开元天宝时期做出的具体示范。



◆《中国石谱》

寿嘉华,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员,曾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现任全国地层委员会主任、中国观赏石协会会长、中国地质调查局高级顾问。他负责编撰的《中国石谱》2016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中国石谱》是中国观赏石协会“十二五”规划的创新工程,是一项基于国家课题支撑的全国性立典工程,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项目支持,由山东地质调查院、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具体承担,中国观赏石协会组织和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和有关专业人士实施编撰。该丛书一函六册:第一册《中华赏石文化史论(古代—近

代);第二册《中华赏石文化史论(当代)、《中国历代石谱文献概论》;第三册《中国观赏石资源及分布》;第四册《中国观赏石图典 I》;第五册《中国观赏石图典 II》、第六册《中国观赏石图典 III》。

《中国石谱》全面系统梳理中华赏石文化的发展历史,精细爬梳石文化史料,精确汇集全国观赏石资源调查的全新成果,荟萃了国内众多藏家的精品藏石,集中展示了中国观赏石收藏与鉴赏的历史与文化、传承与创新、资源与分布、典籍与精品,是一部中国观赏石百科全书类的典籍,是一部历史书,又是一部工具书,还是一部精品集。

